

一种文化的结构分析

江苏教育出版社

yizhong wenhua de jiegou feng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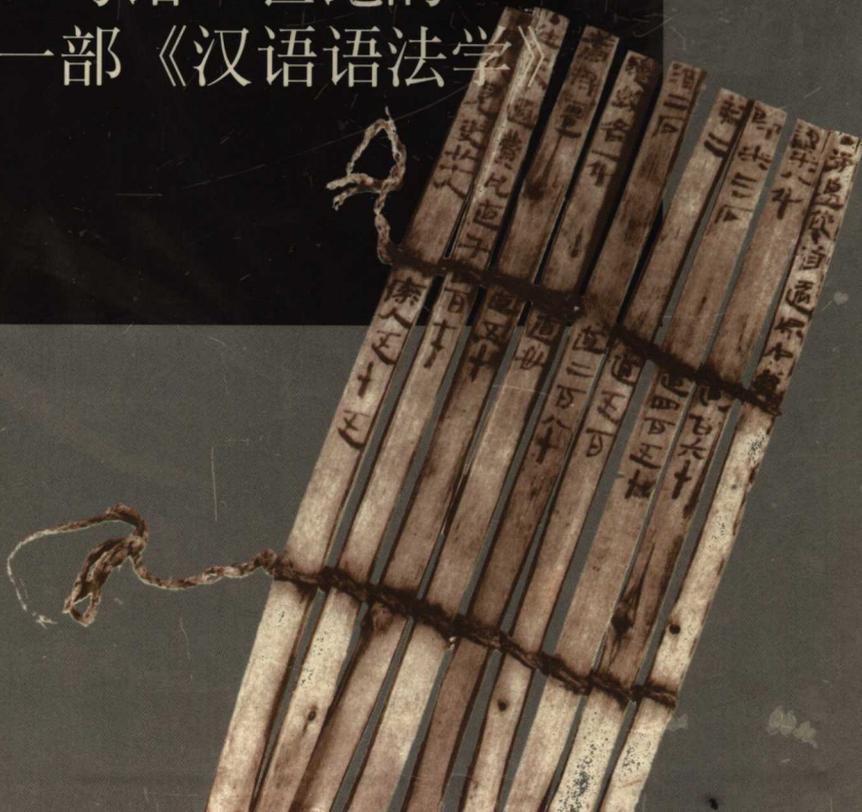
汉语语法学

yufaxue

申小龙

著

写给21世纪的
第一部《汉语语法学》



478892

写给

21

世纪的

第一部《汉语语法学》

Hanyu yufaxue

江苏教育出版社

汉语语法学

一种文化的结构分析

Hanyu yufaxue

汉语语法学

——一种文化的结构分析

申小龙 著

责任编辑 杨九诠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马家街31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edu-publisher.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东山镇金箔路203号, 邮政编码: 211100)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31.25 插页 4 字数 392200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5343-3767-4

G·3462 定价: 45.00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苏教版图书邮购一律免收邮费。邮购电话: 025-3211774, 8008289797, 邮购地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 江苏教育出版社发行科。盗版举报电话: 025-3300420、3303538。提供盗版线索者我社给予奖励。

前 言

写给 21 世纪的第一部《汉语语法学》

感谢历史的机遇,让我们这一代为 21 世纪献上第一部《汉语语法学》。

自 19 世纪末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问世以来,汉语语法学已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我们 50 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也许并不能体会上一个世纪之交先贤在“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旗帜下,以引进西学为己任,开辟汉语语法研究新路径的激动心情,但我们对先贤充满尊敬。我的硕士、博士学位导师张世禄先生,就是本世纪初为中国语言学引进西学的一位先驱。而也正是他,在晚年即我们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读书期间,第一个系统批判了汉语语法学在本世纪的“西化”道路,掀开了汉语语法学改革的崭新一页。我成了张世禄先生招收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攻读语法学的博士生,毕业后又担任他的学术助手。许多人也许不知道,八九十年代以“文化认同”为旗帜的语法学乃至语言学范式革新,正是在这样一位西学先驱的思想指引下,深入而又持久地进行的。

什么是汉语语法？我们在中学里学过的“汉语语法”，现在已在中学语文教学“淡化”；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汉语语法”，现在正在日趋“繁化”。无论是“淡化”还是“繁化”，都说明 20 世纪的汉语语法学，因其深刻的西学背景，与汉民族的“语感”和“文化感”（文化认同）相背离。这种背离暴露出中国现代语法学在精神上的积贫积弱，即文化上的单线进化论、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我在 80 年代曾发表文章指出 20 世纪汉语研究的两大失误：

第一 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汉语本体意义上的语言观。

我们接受了索绪尔的学说，于是汉语在我们眼中是一个符号系统，我们接受了斯大林的思想，于是汉语理所当然只是我们使用的一种交际工具。“符号”也好，“工具”也好，汉语都是一种我们可以对之作客观、冷静处理的身外之物。于是，冷漠的知性分析成为汉语学的最圣洁的科学原则。描写主义在我国语言学中蔚为大观，达到一种巅峰状态。见物不见人，务“实”不务“虚”，成为一种病态的时髦。淡化汉语的人文价值，使我们不得不紧紧依赖西方语言分析流派中科学主义的思潮，而这种被我们宠坏了的科学主义原则为了涵盖汉语的人文精神，又不得不对汉语的人文价值施行更彻底的“决裂”。其结果是，汉语的结构分析越来越“紧”，越来越精致化，所用的语言材料越来越“单薄”，越来越欧化。我们用现今所使用的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来分析一部汉语的文学作品，其结果必然是：一小部分“主动宾”型的“正统句”，然后是一大批“复句”。说穿了，就是除了能套进西方语言模式的少数句子外，其他句子统统扔进了“复句”的垃圾箱。这难道就是汉语句型系统的本来面貌吗？为了那一小部分“主动宾”句的严密性、精密化，就必须付出将占汉语句子运用主体的大批流水句（复句？）弃置的代价吗？既然“主动宾”型的“紧”结构无法涵盖汉语句子的“松”格局，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汉语为本位建立一种“松”型的、可以包容“主动宾”的结构模式呢？显然，隐含在这种文化行为之后的依然是语言观的作祟。因为“松”型的语言分析模式，必然是一种具有很强的逻辑凝聚力的模式，必然又是一种主体意识得以充分体现的分析模式，而戴着西方语法有色眼镜的精密型科学家们很自然会问：这还是语法吗？有这样“主观”的语法吗？他们宁愿在什么是“主语”，什么是“宾语”，什么是“名词”，什么是“动词”这些很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洋范畴上争得面红耳赤，或者说一声“主语的语法地位不重要”而鸣金收兵，付之阙如，也不愿改变他们潜意识下的语言观。

我们认为，汉语作为汉族人世界观的一种象征符号，它是一种主体意

识很强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性”。这种主体意识在语法上的浅层表现就是它的尚简和多变。由于尚简,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块的堆叠、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汉语的这种尚简的组织战略,放弃了西方形态语言视为生命之躯的关系框架,把受冷漠的形态框架制约的基本语粒或语块解放出来,使它们能动地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体现出强烈的立言造句的主体意识。因此,汉语语流中的单位实体,是一种多维开放的实体,是能动地体现交际意识的“活”体。近年来我们力主汉语句子的成立要素,首先是某种特定的表达功能而非某种先验的“洋”形式框架,就是基于这种汉语观。从这种释放人文价值的汉语观出发,目前我们所使用的一整套汉语分析原则、方法、程序,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或严格限定其科学价值,以使我们的语言分析越来越接近而不是远离汉族人辩证的语文感受。

第二 我国现代语言学没有自己深厚、鲜明的文化哲学。

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任何语言学大师对语言本体及方法论的认识,无不浸润着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博洽而精深的理解。任何辉煌的语言学说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哲学精神。而任何模仿因袭的语言研究,即使它有恢宏的构架,精致的外壳,它在哲学上必然是苍白的,它在文化渊源上必然是断裂的,它的土壤必然是化肥过后的一片板结与贫瘠。从主流上说,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百年正是没有文化哲学的百年,缺乏汉语精神的百年,淡化民族主体意识的百年。在本世纪初的新旧纠缠的文化震荡之中,从我国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文化断层也在历史地形成。这一断层在初具规模的 30 年代曾引起语言学界有知之士的关注和研讨。而在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潮水般涌入之时,这一断裂立刻被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新层面,在它上面迅速搭起了中国现代语言学恢宏的脚手架。由此产生的新的历史惯性竟使人们在半个世纪中汲汲于圆说西方语言理论概念体系,直至将汉语分析的一个个基本领域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仍无意对脚下的文化断层作出已经过迟的反省。直到 70 年代后期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对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会的建树及其酸果才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和“回甘”的机会。汉语语言学界正在意识到,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样,要到中国文化中去寻找根据,而不是到西方的菩提树上去摘下一串现成的果子。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语言科学既是沉重的包袱,更是巨大的财富。离开了这个基础,中国现代语言学

就没有立足之地。

由于人文价值的淡化,汉语学在纯形式分析的道路上越走越窄,日益孤立于整个人文学、社会科学界,日益孤立于语言交际、语文应用的广阔领域。因此,当我们埋怨国家不重视语言学的时候,当我们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缺乏共同语言的时候,当我们苦心经营的成果不被社会科学刊物接受的时候,当语言学专业的招生无人问津的时候,当在社会科学活跃的各种场合语言学干脆被世人遗忘的时候,我们一不怨语言学的“特殊”,二不怨天尤人,只能怨我们自己抛弃了汉语和汉语学的人文价值。淡化还是强化语言学的人文价值,是中国现代语言学滞后与领先的关键。目前哲学、文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都在关注语言问题,不少著名的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都已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汉语独特的人文性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的浓厚兴趣与深入的思考。可以预言,三五年后,语言问题将是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一个理论热点。如果我们语言学工作者再不从“滞后”状态中猛省,我们将错过一个极其宝贵的历史时机,失去整整一代文化精英的参与,失去整整一代以至几代青年人的理想和创造力。

(《社会科学》,1988,6。)

虽然,这样一个当时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反思,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可能过于理想主义,但中国语言学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自觉的人文主义精神,有了人文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北京大学教授高一虹在主编英文版 *Collected Essays of Shen Xiaolong on Chinese Cultural Linguistics* 的前言中画出当代文化研究的几条轴线,认为“申在以上绝大多数立场之轴的位置都是极端而非中庸的。作为一个‘激进主义者’,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致于有人用‘申小龙现象’来概括他的理论造成的影响。这种现象不仅可归因于申小龙非同一般的个人素养,而且可归因于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它给后殖民世界的文化多元状况增添了一道新的景象”。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以及多元文化间的理解与对话,正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中国语言学就必须走出通行 20 世纪的西方理论规范,建立文化认同的新范式。这也就是本书的书名《汉语语法学——一种文化的结构分析》的涵义。

当江苏教育出版社杨九诠先生亲赴上海与我商量写一本《汉语语法学》的时候,我还有些犹豫。因为我刚收到张斌先生送我的《汉语语法学》。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体系性的、听上去“面面俱到”的书,是老一代学者用来集大成

的。一位编辑曾告诉我,他们出版社组织一套语言研究类“集大成”的书,作者中邀请了个别中青年学者,结果其他老年作者集体拒绝。然而杨九诠先生告诉我,江苏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这一类书,以传统学术的创新为其宗旨,面向21世纪的学科发展。它不是个人或学科的总其大成,而是理论和方法的推陈出新;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将来。他们在语言学各个领域寻找合适的作者,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他的话使我非常感动。本书的写作也就按照我个人的创新思路展开:

首先,是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结构通约,即汉语语法与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同构,把语法作为一种文化的结构类型来研究,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

其次,是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贯通起来。当代由于学术的分科越来越细,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事实上,汉语语法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不研究古代汉语,难以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汉语的结构特点,会在大量欧化现象和欧化理论中迷失汉语语法的本质。本书同时分析了上古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的语言材料。我愿在21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中做这种古今贯通的先行者。

其三,是做专书穷尽性的语言调查。当代语法研究中用西方的学说讲中国的例子的很多,但穷尽性的语言调查很少。举例性的研究便于理论的构架,然其弊在回避了许多事实真相。如果一种语法理论必须无遗漏地分析特定时空中所有的语言材料,那它必定得放下“架子”,从实际出发,检讨自身的种种“过于概括”或“不当概括”的问题。我认为专书穷尽性的语言调查是使汉语语法理论“到事物本身”的重要途径。

其四,是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将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在汉语的语法研究中,共时描写的观念十分流行,因为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时间的干预只会扰乱共时的状态。然而反过来,共时的分析如果缺乏历史依据,那么这样的分析又有多少价值呢?说到底,任何事物或单位都同时处在共时之维和历时之维上。本书正是用汉语史的发展趋势揭示了古今汉语共时平面体系的许多特点。

其五,是将语法的结构分析与结构的使用频率结合起来。在汉语的语法体系中,哪些类型是真实的类型,哪些类型是虚假的类型,哪些类型是主导类型,哪些类型是次要的类型,这些都牵涉到汉语的本质问题。单靠结构分析本身,是无法认识这些问题的。因此,结构的使用频率为我们理解结构的价值提供了重要依据。本书在这方面做了大胆尝试。

其六,是清理和阐释中国古代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使之转化为现代的汉语语法理论和方法。汉语语法学的文化认同,不仅要探讨语法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通约性,而且要积极阐释中国语文传统。中国语文传统与西方语

文传统的不同,不是所谓“前科学”与“科学”的不同,而是两种研究范式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由语言的特点、文化的特点决定的。在中国语文传统中,包含着古代研究者对汉语的深刻的体认和理解。这种本质理解对于健康发展的中国语言学,具有永恒的意义。而中国 20 世纪的语法研究经西学改造之后,割断了与中国语文传统母体的联系,因而游离于汉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属性之外,成为一种“无本之木”。本书在汉语语法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中对传统语法理论作了新的阐释,并由此确定了汉语语法分析的一些基本原则。

其七,是将汉语语法分析与中国哲学、文学等其他文化现象的分析结合起来,将汉语语法学与中国文化研究融为一体。本书这方面的探索在“主流”语法研究者看来一定是非常“出格”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语法研究必须是纯而又纯的,就像美国语言学者描写一种陌生的印第安语,必须排除一切“形式”以外的干扰。这种纯化的语法舍弃了许多对于汉语来说是本质的东西,例如语义,例如语境,例如功能,例如韵律,结果导致现在的汉语语法教学就像外语语法教学。他们忘了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是我们的存在之家,是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怎么可能割断自己与母语的联系,而把她像对待一种异族语那样作纯形式的分析呢?如果没有对母语的结构的真切的、深刻的理解,我们又如何把它转化为电脑或外国人所能掌握的“语法”之术呢?我们现在有了“外语教学”式的汉语语法,有了“机器处理”式的汉语语法,却就是没有作为母语的“文化认同”的汉语语法。

以上诸点,就是本书在汉语语法学上的新思维。这些思考,发端于我大学学士论文《论深层结构》,又经过硕士论文《〈左传〉主题句研究》和博士论文《〈左传〉句型研究》撰写过程中张世禄师的指导,经过十多年来对近现代汉语语法、中国传统语法学、西方语法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直接采用西方理论和方法且延续一个世纪的 20 世纪流行范式相比,这个新范式显然是稚嫩的、不成熟的,但它会成长起来。

语言研究的文化认同,尤其是语言结构研究的文化认同,只是 15 年前一个张世禄先生指导的青年研究生的设想。然而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却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激烈的争论持续至今,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的汉语学者也都加入到论争之中。这一想法又直接促发了我国语文教学界连续十多年的“语文工具论”与“语人文论”的激烈的论争。许多著名的前辈学者,如张世禄、姜亮夫、陆宗达、季羨林、张志公、殷焕先、倪海曙、许威汉、郭在贻、何乐士等,对我的研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季羨林先生多次在海内外发表文章支持我的观点,并和张志公、许威汉先生一起担任我主编的“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的顾问。我的中学老师、著名的中学语文教育家于

漪先生也热情肯定我的汉语语法人文主义观点。于此同时,也有许多争论、责难和否定意见。其中多数意见是学术之争,我很欢迎。也有一些意见来自“权威话语”,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上纲上线,批倒批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许多同仁要我积极回应,澄清事实,海内外许多刊物要辟专版供我反驳,我皆一笑置之——我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我在刊物上看到季羨林先生起而为我辩驳的文章,心里非常感动。他说:

对于在某一个学科内敢于提出新见解的人,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鼓励,而不是指摘。鼓励并不等于承认他所说的一切全都是正确的。这是不可能的。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在学术上的新见解,决不可能一出世就十全十美。发扬正确的方面,纠正甚至于完全推翻不正确的方面,是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在评论一种新见解或者与个人看法不同的见解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决不应与此相反,更不应该像我们过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那样扣帽子,扣帽子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我是一个不喜欢争论的人。从文化的不可通约到思想的不可通约,我对辩论、反驳、捍卫或寻求理解,抱着淡漠的态度。我不回答任何批评,只是埋头著述。一本书出版后,会有各种意见,人们会想象、甚至制造出各种“申小龙”,但那已与作者无关。因为作者的思想人格已充分展示在书中了,对于种种陌生的“申小龙”,他是无需置喙的。我十几年的写作,就是在这种静默中进行的。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中国哲人的话: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感谢我的妻子韩杨给予我真挚的爱,感谢我的儿子申逸如给予我的快乐和幸福!

目 录

前言 写给 21 世纪的第一部《汉语语法学》/1

第一章 汉语语法的文化特征/1

第一节 以神统形/1

- 一 文化观照下的语言形神关系/1
- 二 汉语语法的神形同构/4
- 三 汉语语法的神形异构/8
- 四 汉语语法的以神解形/15
- 五 汉语语法与中国美学精神的统一/20

第二节 虚实格局/24

- 一 语法的“形之下”与“形之上”/24
- 二 汉语语法结构之虚/26
- 三 汉语语法意义之虚/30
- 四 语法虚实的语境制约/32
- 五 语法经济的强制与自由/35

第三节 弹性实体/38

- 一 由至简而灵动：中国文化的实体观/38
- 二 动之静与静之动/42
- 三 虚之实与实之虚/45
- 四 动、静、虚、实的相涵相摄/50
- 五 由功能弹性到形式弹性/55

第四节 流动建构/61

H
A
N
Y
U

Y
U
F
A
X
U
E



001

- 一 流动铺排与语法之气/61
- 二 意向类型与文气格局/64
- 三 结构限度与信息焦点/67
- 四 句法流动与文化通观/72

第二章 汉语语法学方法/74

第一节 走出西方语法的大纲/74

- 一 汉语语法学的西方“大纲”/74
- 二 从“修补大纲”走向文化认同/77

第二节 语序分析/83

- 一 语序与事理/83
- 二 语序的研究类型/87
 - (一) 非论元成分的语序/88
 - (二) 论元成分的语序/90
 - (三) 汉语语序理论/92

第三节 语气分析/96

- 一 语气与句子表达功能/96
- 二 语气与虚词功能/98
- 三 语气与句子声气组织/104

第四节 语义分析/108

- 一 由“深层结构”看汉语语义/108
 - (一) “深层结构”是语义结构/109
 - (二) “深层结构”的语义启示/114
 - (三) “深层结构”的语义解释力/116
 - (四) “深层结构”的语义盲点/119
 - (五) 汉语的深层语义理论/122
- 二 语义知解与语感认同/126
- 三 多元析解与相对分类/129
- 四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133

第五节 句读分析/142

- 一 音句之读与义句之读/142
- 二 流块堆叠与“名词重点”/145

第三章 汉语句型/151

第一节 汉语句首成分的理解框架/151

- 一 “合治”论/152
- 二 “分治”论/155
- 三 “双平面”论/159
- 四 “双句型”论/161

第二节 汉语句型的心理现实/164

- 一 焦点视与散点视/165
- 二 主谓视与非主谓视/169
- 三 单域视与双域视/172
- 四 层视与核视/174

第四章 汉语名句——主题句/179

第一节 主题句的类型学意义/179

- 一 汉语“主谓”理论递嬗/179
- 二 主题句与汉语句型特质/185

第二节 主题句的功能系统/190

- 一 现代汉语系统/190
 - (一) 简单主题句/191
 - (二) 复杂化的主题句/207
- 二 古代汉语系统/212
- 三 汉语史趋势/226

第三节 名句与动句的合璧/230

- 一 现代汉语系统/230
- 二 古代汉语系统/233
- 三 句型的复杂化/241

第四节 被动句解构/243

- 一 被动句的形式与意义/243
- 二 被动句的理论问题/251

第五章 汉语的动句——施事句/257

第一节 单段施事句的系统和历史趋向/258

- 一 一个动词的单段施事句/258
 - (一) 现代汉语系统/258

- (二) 古代汉语系统/260
- (三) 汉语史趋势/269
- 二 多个动词的单段施事句/272
 - (一) 现代汉语系统/272
 - (二) 古代汉语系统/273
 - (三) 汉语史趋势/276
- 第二节 多段施事句的系统和历史趋向/281
 - 一 双段施事句/281
 - (一) 现代汉语系统/281
 - (二) 古代汉语系统/283
 - (三) 汉语史趋势/287
 - 二 三段以上施事句/296
 - (一) 现代汉语系统/296
 - (二) 古代汉语系统/298
 - (三) 汉语史趋势/309

第六章 汉语关系句/316

第一节 关系句的功能认定/316

- 一 功能与逻辑/316
- 二 功能与标志/318

第二节 关系句的功能系统/319

- 一 现代汉语系统/319
- 二 古代汉语系统/325
- 三 汉语史趋势/350

第三节 关系句的耦合功能/354

- 一 耦合句的语义类型/354
- 二 耦合的世界观/367

第七章 汉语词类/373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词类观/373

- 一 传统的阐释: 上古时代/374
- 二 传统的阐释: 中近古时代/377
- 三 义类本体·语义组合·句读功能/381

第二节 动词的功能与类别/383

- 一 动词的分类/383
- 二 动词与复杂宾语/395
- 三 动词的重叠/400
- 第三节 形容词的功能与类别/407
 - 一 形容词的功能系统/407
 - 二 形容词的重叠/419

- 第八章 汉语语法学与中国文化建设/426
 - 第一节 语法与哲学/426
 - 一 哲学的语法背景/426
 - 二 从《尚书》到《左传》/429
 - 三 语法的哲学观照/434
 - 第二节 语法与文学/436
 - 一 语言史与文学史/436
 - 二 语法发展与诗制递嬗/439
 - 第三节 共性与个性/446
 - 一 汉语研究中的个性倾向与共性倾向/446
 - 二 汉语研究中个性与共性的张力/450
 - 第四节 单极与多元/458
 - 一 单线进化论与形式主义/458
 - 二 多元文化传统与功能主义/467

- 附录/ 高一虹：英文版《申小龙文化语言学论文集》前言/473

第一章

汉语语法的文化特征

第一节 以神统形

一 文化观照下的语言形神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文化的差异,可以归结为语言之形神关系的差异。语言以形式传达意义,在意义对形式的依赖方式和程度上,中西文化选择了迥然有异的路径。西方文化认为,世界与人的关系是一维、平面的关系。人为了认识世界才和世界发生关系。于是人被从他生存的世界中分离抽象出来,努力去追求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确定性。西方哲学家们在对世界本原的探讨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世界的“始基”。如泰勒斯的“水”,以万物皆由水而生成,又复归于水;赫拉克利特的“火”,以火为万物本原,一切皆火的燃烧和熄灭;毕达哥拉斯的“数”,以数为事物的原型,构成宇宙的秩序;柏拉图的“理念”,以理念为个别事物的范型;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以原子由不同秩序和位置的结合产生物体。他们都力图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抽象出某种纯粹形式的简单观念,追求一种纯粹的单一元素,来建构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是前提,人的认识由客观给予,作为认识载体的语言,其意义也由客观到主观。于是确定性和形式化成为西方人思维和语言的特质。当主体和客体分离,承担主客体关系纽

带作用的语言就力图与客观世界完全对应。西方语言以丰满的形式特征描述确定的意义世界,正是要将被割裂的主、客体联系起来。如果没有这种确定性和形式化,面视客体的主体就无法去把握世界。

西方语言由其哲学本体论而规定的“以形摄神”的建构方略,在西方语言学家的论述中也清晰地表露出来。萨丕尔在论述“语言的成分”时十分肯定地说:“总括起来说,从言语的现实里抽象出来的语言的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适应从经验的现实里抽象出来的科学的概念世界;而词,作为活的言语的现实存在的单位,则适应人的实际经验的单位、历史的单位、艺术的单位。句子呢,只有在我们觉得它是由深藏在词里面的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所构成的时候,才是完整思维的逻辑的对应物。”^① 语言与世界的“适应”和“对应”,使西方语言具有很强的形式自足,即语言要表达的各种意义与关系大都有了形式上的标志。于是西方的语法分析也就追求最大限度的形式化描写,由此形成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或“现代语言学理论”,本质上也是一种形式理论。

中国文化并不把人与世界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与我为一”。人被视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赞天地之化育”,与宇宙精神相往来。没有割裂和分离,也就没有必要与世界重新发生关系,也就不存在对世界的视觉模式的认识,因为人体现了世界和宇宙的各个方面。《中庸》在这方面作了清晰的表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天地万物之性与人性是一致的,尽人之性可以尽物之性。这是一种与西方“主客二分”不同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

中国从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以来约七千年中,以农耕为主的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一直在中华民族的全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科学的发展主要和农业生产相联系。这种田园文明把人和自然界看成是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把世界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如李约瑟等西方科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于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由此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形式,其特点就是坚持普遍联系、整体考察。“合一”成了一个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思维模式:知与行、内与外、阴与阳、形与神……所强调的都是相互融合、沟通、作用。这种思维模式必然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带有综合性的特点,反映在语言和语言分析上就是注重言与意的统一,以神统形。运思的方向不是指向形式

① 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20页。